

人文经济范式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价值取向、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

◎ 袁富华 李兆辰

内容提要 当代人文经济探索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福利资本主义传统的人文资本主义探索，由于福利国家的自身矛盾而在混合方案中左右摇摆；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内在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实现了价值取向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成为 21 世纪新范式的引领者。文章立足于思想史和理论比较，对人文经济范式的主要内涵与核心命题进行提炼与阐释，基于过程与联系的系统论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给出了人文经济意义上的解读。人文经济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源于高度城市化时期民生改善和风险处置的迫切需求，要求发展方式必须转移到效率与公平协调的路径上来，更好促进“人的发展”。只有从“范式”层面理解人文经济，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代化道路新选择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 人文经济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公平 城市化 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F012; 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5)07-0102-10

DOI:10.15895/j.cnki.rwzz.2025.07.008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反向运动，人文经济思想历史悠久。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复兴，是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影响和传统福利国家局限的过程中产生的，期望针对高度城市化时期的新问题新需求提出一些应对措施。人文经济范式的目标是人的发展，其主要探求与基本需求和民生改善相关的具体现实问题，主张通过发挥国家作用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容。相同或相似问题在当代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福利国家理论、政策政治学中得到广泛探讨，基本共识是人文经济将成为 21 世纪新范式。人文经济范式对于社会公平、目标平衡、系统观的理想追求，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成为新范式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特征，学界已有一些相关论述。^②现有文献梳理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管理机制研究”(24ZDA08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实验室综合资助项目“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2024SYZH004)

①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 年第 16 期。

② 参见胡均、施九青《确立“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改革与战略》2009 年第 11 期；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

演进和概念内涵^①并尝试将人文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现有研究,需要将研究视角由外在“特征”转向内在“范式”,充分运用人文经济的逻辑、方法和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只有从“范式”层面理解人文经济,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代化道路新选择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立足于思想史和理论比较,本文对人文经济范式的核心命题进行提炼和阐释;基于过程和联系的系统论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人文经济意义上的解读,并分析了新时代人文经济的实践取向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路径。本文强调市场经济嵌入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明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要求及其在当代的前沿引领意义。

一、人文经济范式的主要内涵与核心命题

人文经济范式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导向,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公平约束下的市场经济,其内涵涉及当代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福利国家理论等诸多具有人文色彩的学科领域。当代人文经济范式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两条主线:(1)自西斯蒙第把经济学目标确立为最大限度地“人的发展以及所有人的发展”之后,人文经济思想就一直在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对抗中延续发展。^③作为理念妥协的产物,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起福利国家或福利民主模式——一种资本主义自利原则与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混合物。基于社会权利这一关键要素,福利国家模式定义并推动了社会公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经济理念的复兴,也是出于约束市场力量的考虑,防风险、保民生、谋发展等现实问题相应成为关注重点。(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内在人民性,本质上蕴含着人文经济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这一点上不同于作为混合物存在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

从系统论角度看,上述两条理论主线有着一些相似的观点。一般认为,人文经济范式主要围绕两个基本伦理要求建立起来:一是生态伦理,强调生产活动嵌入动态的代际可持续发展;二是自我实现伦理或者人的发展伦理,强调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④可以看到,人文经济范式是从现实问题入手,侧重于认识方法的系统观和整体观。本节拟基于“经济(市场)—国家(政府)—社会文化(家庭)”系统框架,从价值维度、制度维度和治理维度三个方面,对人文经济范式的主要内涵与核心命题进行提炼阐释。

1. 价值维度:共同利益与社会公平

共同利益与社会公平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价值观。共同利益是一个经常出现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理念,相似的表述还有共同理想、共同价值、民族团结、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集体利益等。调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平衡效率与公平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追求。其中,“个人利益”对应着技术上的必要条件——效率,“共同利益”对应着制度规范上的充分条件——社会公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⑤有了这两个条件的保证,才能期望和谐社会中的人的发展。当然,共同利益一词也被西方研究者广泛使用,正像理查德·托尼所说的那样,为了共同利益而制定的福利政策,旨在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社会秩

① 参见王忠、车学森《人文经济学研究:理论演进和话语创新》,《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胡承槐、顾青青《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对象、方法及其实践性、科学性》,《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② 刘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经济问题》2025年第4期。

③ M. A. Lutz, *Social Economic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pp. 237 ~ 238.

④ W. W. Harman, “Humanistic Capitalism: Another Alternative,”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vol. 14, no. 1, 1974, pp. 5 ~ 32.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序,人们对它的渴望不仅仅在于收入增加,更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更加人道的社会文化、社会文明和生活方式。^①

共同利益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具体体现为福利国家模式的“广义罗尔斯原则”:主张弱势群体地位改善、个人能力提升和社会风险分担,支持效率与公平兼容。其中,“广义”一词强调福利政策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必须从社会文化系统中吸收价值准则。这种准则不是个人偏好的混合物。福利国家是共同福利的促进者,有着比个人福利简单加总更复杂的内容。^②比较而言,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内在于社会主义本质。由此进一步引申出一个认识,即人文经济范式中的“人的发展”,只能是作为“社会人”的人的发展。^③这是区别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要点。

2. 制度维度:基本需求满足与目标平衡

基本需求满足与目标平衡是经济社会制度的目的与任务。共同利益和社会公平旨在为人的发展提供某种社会准则和制度规范。现代化历史上,受到工会运动和福特主义管理革命的推动,加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思潮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率先开启了福利国家建设尝试。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随着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长期演化发展,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黄金时期,社会权利主导的福利体制在发达国家得到完善,并成为协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重要手段。社会权利表现为一整套公共服务政策,旨在定义机会平等、实现发展分享、满足共同利益、巩固社会稳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斯洛创立了“以人中心”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安全、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求,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应通过维护公民权利和公平正义予以保障。^④

从基本需求满足这个关键问题出发,卢茨认为人的目标应该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就是追求多元目标平衡。因此,不应把经济学简单视为“选择学科”,而应视为受到价值目标约束的社会哲学,^⑤这是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第二个要点。当然,目标平衡这个说法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综合平衡、战略目标、总体目标等词语,事实上一直存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论述之中。但是,在下述意义上,这个术语仍是“新”的:第一,来自经济社会学和福利国家理论的研究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局限在于,用一种“去历史”“去制度”的功利主义抽象理论,指导甚至规定具体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现实;那种注重最大化利润或需求满足的单一目标,排除了再分配与社会公平,帕累托效率至多充当了促进人的发展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第二,目标平衡原则认为,人的发展和偏好是多元的、变化的,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文化需求,都构成基本需求满足的互补要素。比如,罗斯托认为,随着工业化走向成熟并进一步转向福利社会,人文目标应运而生。此时,国家政策应当以目标平衡为导向,而不是局限在单纯的利益最大化计算上,人应该被视为利益和发展的综合体,包括利益追求、文化价值、民主参与等。^⑥

3. 治理维度:国家调控与社会整合

国家调控与社会整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取向。社会文化系统的价值观需要国家引导和培育,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分享需要公共资源和法治给予保障。人文经济要求国家站在全局角度

① [英]R. H. 托尼《论平等》,高景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94~97、239 页。

② 参见 G. Esping-Andersen, D. Gallie, et al.,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xv~xix; [英]T. H. 马歇尔、[英]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等级》,郭忠华、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86~87、113 页。

③ R.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pp. 34~40.

④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3、18~30、37 页。

⑤ 参见 M. A. Lutz, *Social Economic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pp. 249~250; M. A. Lutz,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Human Dimensions,” *Humanomics*, vol. 10, no. 4, 1994, pp. 49~75.

⑥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45~154.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集中调控功能。这是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第三个要点。

福利国家依赖政府的集中调节作用,按照奥康纳的说法就是:福利国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个体系,即在满足私人资本积累需要的同时,把社会各个阶层整合成相互耦合的系统,以期赢得民众忠诚进而获得政治合法化。^①对此,克罗斯曼和奥菲说得更为直白,福利国家试图寻求资本主导之下的共同利益,尽管资本主义与福利制度不相容,但仍需在不可逆转的福利国家中生存发展。^②福利制度不可逆转的原因有很多,从消极方面来说,需要以集体分担方式应对高度城市化风险,典型如社会保障制度,即波兰尼意义上的“去商品化”;从积极方面来说,国家需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教育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以便促进劳动力和社会资源的“商品化”,维持经济稳定发展。

可见,国家集中调控旨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协同。但是,要达到这种效果,就需要整合群体利益,目前有两种代表性治理方案: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民主式阶级斗争”,即国家调节之下企业—工会之间关于利润分享、责任权利的谈判与妥协;^③一种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统一、统筹规划、系统连续是中国之治的特点。理论上来说,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案,只要考虑到了社会公平和共同利益这个基本前提,就是采取了一种人文主义的认识、实践路径,也就是采取了超越功利主义的、更加综合的权利权益观,这是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第四个要点。

至此,我们得到了人文经济范式的三个核心命题:在价值维度上,遵从社会公平的前提;在制度维度上,注重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同;在治理维度上,强调国家的集中调控功能和社会整合。

二、人文经济范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文经济范式的核心命题,其理论价值取向是人文经济范式的典型代表,其实践价值取向是人文经济范式的前沿创新。对此,本节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人文经济范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进行解读。

1.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价值取向

为了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组织管理要求,同时出于应对高度城市化时期“新社会风险”的需要,^④发达国家确立了社会权利主导的福利国家模式。鉴于资本主义与集体利益的内在冲突,这种模式实际上是通过“民主式阶级斗争”达成的混合物,一种被称为“民主+福利+资本主义”的复合(而非有机融合的)新型秩序。^⑤正是这种混合特征,导致福利资本主义的理念摇摆与发展不稳定,面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加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完善福利国家和人文经济的呼声再度兴起。^⑥

中国式现代化与之不同,我们应该从价值取向与现代化内在有机统一的角度进行理解,这种融合与统一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人民性。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始终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直接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时代性。^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实现共同富

① [美]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5页。

② 参见[英]T. H. 马歇尔、[英]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郭忠华、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129页; C.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p. 153.

③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26、174~175页。

④ G.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5~146.

⑤ [英]T. H. 马歇尔、[英]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等级》,郭忠华、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129页。

⑥ J. Komlos, “Humanistic Economic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21st Century,”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vol. 96, 2021, pp. 184~202.

⑦ 陈新夏《唯物史观价值维度的当代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裕。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人民性与现代化的融合逐步深入:价值观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为前提,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益;制度安排上,沿着小康、全面小康、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行战略规划,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治理方式上,根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价值取向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性的本质出发,贯穿于中国“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国家治理的主线是“小康—全面小康—共同富裕—民生工作永无止境”,可以说,体制改革深化与理论实践创新都是围绕民生改善这个根本认识展开。执政为民、改善民生既是中国制度完善的基线,也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准绳。接下来,从实践层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围绕其实践发展的三个关键阶段进行阐释。

(1) 取向于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阶段的发展重心是摆脱贫困陷阱,实现基本物质需求的普遍满足。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摆脱贫困陷阱。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 20 世纪末,出于工业化的迫切需求,中国经济增长带有显著的发展主义色彩。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的发展主义有两个要求——国家的积极有效干预与正确的次序选择,^①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第一,次序选择上,党的十三大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制定了温饱、小康、共同富裕的“三步走”战略,成为其后各个阶段现代化任务的重要参照。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下,这个时期已经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先行条件的重要性,经济基础领域重点支持农业、科教、交通、通信发展,制度基础领域深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中国特色的国家调控框架基本形成。正如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至此,单纯就调节目的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二战后福利国家模式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即有组织的市场经济。

(2) 取向于全面小康的科学发展观

这个阶段的发展重心是避免“无发展的增长”,在提升生活品质基础上扩展基本需求。从执政为民、改善民生这条制度基线来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坚实迈进的一次重要理论发展。这个重大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发展主义的增长优先战略,推动中国迅速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成功过程也有代价,即城乡、阶层收入分配问题开始显现。其次,正如新发展观所预见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普遍发生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趋势,分配不均、贫困化等“无发展的增长”问题加剧。^②为此,国际上对于根植本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的呼声兴起,在此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社会政策扩展,期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贫困人群。

在已经实现总体小康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上基本实现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缩小城乡和区域差别;政治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依法保障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社会文化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生态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了新世纪新阶段的科

^① C.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 Woo - Cu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 ~ 60.

^②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 年,第 15、92 页。

学发展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时期推出了两项重大制度举措,即 2006 年取消农业税和 2011 年实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的重要贡献在于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现代化,它不再单纯作为增长优先的配套制度,而是以人民权益的制度化切实推动社会公平,奠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与经济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基础。

(3) 取向于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阶段的发展重心是塑造效率—公平兼容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目标平衡的人的全面发展。从执政为民、改善民生这条制度基线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坚实迈进的再次重要理论发展。2012 年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新时代理论实践创新的关键。一方面,国内高度城市化趋势加速,呈现出与工业化不同的新特点、新问题、新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有效应对崛起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外部阻碍与风险挑战。为此,适应新时代的体制机制系统性重构,成为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新时代任务,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人文经济系统观,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引领。为了应对新时代矛盾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框架。从政策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一举措完成了治理理念的整体性重塑,突破了“效率优先”宏观调控的局限。基于这些理论准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一种适应高度城市化要求的、以社会公平为前提和落脚点的平等观和发展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效率与平等兼容的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并以其人文精神成为 21 世纪的现代化前沿理论。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鲜明特征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有序展开。

三、人文经济范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人文经济范式基于社会现实问题而非抽象理论演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其内在的人民性和实践性,成为这种新范式的典型代表。为突出问题导向,本节围绕“经济(市场)—国家(政府)—社会文化(家庭)”系统框架,从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动力三个方面,对人文经济范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

1. 发展阶段:城市化阶段的特殊性

福利国家模式确立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发达国家快速迈向高度城市化的时代,以社会安全网为重要标志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为了应对城市化新风险。但是,福利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资本主导与广大人民利益的内在矛盾导致不稳定,效率与公平兼容的设想难以贯彻到底。从国内外经验对比来看,中国 40 多年快速工业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打下了基础,同时,朝向高度城市化、朝向发达国家水平演进的趋势对于社会权利和实质平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度城市化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可逆转性。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工业化的效率优先思维简单搬到城市化过程中。例如,所谓拉美“中等收入”陷



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业化效率思维陷阱。思维僵化的不利之处在于,长期奉行短期资本利益最大化,将会导致社会治理滞后甚至主要制度缺失。以功利主义单一视角对待高度城市化的复杂关系,最终将导致发展失衡与服务经济金融化。^①

城市化阶段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家庭模式变化及其要求。中国高度城市化趋势改变了传统家庭模式,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像社会学理论所说的那样,城市集聚导致的职业专业化、社会流动性,使得由丈夫、妻子和孩子构成的独立“核心家庭”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突出现象,^②由此衍生出刚性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需求。第二,经济结构变化及其问题。多样化基本需求以及恩格尔定律推动经济服务化,服务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普遍趋势。一般来讲,建立在充分发展了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服务经济,其本质是知识经济,由此衍生出教育支出、高品质生活设施的刚性需求。第三,即使在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也通常伴随着大量“低端”服务岗位的增长,这是服务经济本质使然。因此,相对于工业来说,服务业更易产生收入不平等,知识经济一般有利于教育和技能水平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这种“悖论”同时意味着,应该谨慎对待“去工业化”问题,从创新、就业和收入公平角度来看,即使在高度城市化时期,实体经济仍然必不可少。第四,国家的作用不可忽视。福利国家理论认为,在高度城市化阶段,以家庭发展为核心的人的发展将成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鉴于中国巨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发展阶段特殊性,国家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正是这些特殊现实和特殊要求,把前文所述社会公平原则纳入了城市化过程,使其本质上不同于帕累托原则主导下的工业化。^③根据卢茨的解释,这里再做一点补充说明:该原则强调人在具有共同价值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发展,这点不同于罗尔斯的自由契约观点。

2. 发展要求:新需求与新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欧洲福利国家围绕“积极劳动力市场”建设,推行了以“投资型福利国家”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试图缓和传统分配型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压力。本轮改革旨在应对高度城市化带来的“新社会风险”,即人们熟知的老龄化、人口增长下降、青年失业与长期失业以及社会不公平。为此,基于“育幼—教育—就业—养老”生命历程规划,这些国家实施了一套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包括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家庭政策、人力资本政策,特别强调儿童、年轻人社会投资的重要性。^④当然,这些措施均指向基本需求满足与社会公平,意在缓和自由放任对社会发展的冲击。

建党百年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适逢高度城市化时期,发达国家经历的一些共性问题也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第一,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新风险新需求。这需要联系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巨大的特殊国情。当巨量人口汇聚到城市的时候,城市化首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能否提供充分、优质的就业机会,能否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因此,青年成长问题、就业问题、人口和老龄化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家庭发展之于城市化的关键作用。第二,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国家、区域、城市战略规划应该着眼于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而适时调整。城市化不同于工业化的特征,要求国家治理根据时代变迁创新思路,鉴于城市化经济社会联系的复杂性,把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有效集成,相应成为“中国之治”的新要求。第三,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① 袁富华《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效率与公平关系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② H. Rodman, "Talcott Parsons' View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Family," *Quarterly of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vol. 11, no. 3, 1965, pp. 209 ~ 227.

③ 参见 G.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68; M. A. Lutz, "Social Economics, Justice and the Common G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29, no. 1/2, 2002, pp. 26 ~ 44.

④ N. Morel, B. Palier, J. Palme, *What Future for Social Investment*, Stockholm: Digaloo, 2009, pp. 40, 102.



城市化时期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切实关注到基本需要、避免经济脱嵌于社会,特别是应该抑制短期资本利益最大化和服务经济金融化倾向。

从人文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关键创新,在于紧扣人民利益这一重大发展命题,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新自由主义不能为城市化提供答案,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将会导致拉美式现代化。“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朴素表述,体现了人文经济的深深刻意涵,即不要把“人的经济”混同于“市场经济”、不要把交换价值混同于使用价值,市场经济应该以维持生计为前提。^①只有社会公平以及作为社会公平重要体现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才能谈及高质量发展。

3. 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与包容性创新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②新质生产力的“新”,应当联系这个理念提出的背景及其任务进行理解:高度城市化时期,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是增长的包容性和创新的包容性。当然,从人文经济学来看,城市化对于社会公平的特殊需要,实际上是在给创造性破坏过程设置价值规范,应该将效率追求纳入与公共利益一致的制度框架内,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化对于实体经济的排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很难处理的一个悖论。最普遍、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房地产金融化。缺乏规范的房地产市场,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拉升制造业成本、挤出制造业发展资源,而且以其短期利润最大化行为强化和扩散投机,最终导致全社会耐心资本缺失、削弱实体经济创新基础。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把金融发展锚定在实体经济目标上至关重要,原因很简单:中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仍然需要制造业支撑国家竞争力;中国城市人口众多,金融化将会波及巨量人口的生活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中国大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信息化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这种产业化思路有助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金融化的系统性冲击。

第二,维护产业创新与收入平等兼容。福利国家理论认为,服务化比较有利于教育程度高或者有社会资本的人,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并不友好。这源于服务业的两个内在性质,一是服务业产业关联度总体较低,二是服务业扩张往往伴随着低端岗位的增加。^③维护产业创新与平等的兼容性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提升服务业高端化、现代化以便为制造业优化升级提供足够的知识来源,同时注重新老制造业体系内部的协调以便提供充足数量的就业。其次,服务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为此需要更加重视教育的可及性、均衡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在教育已经有效提升就业能力和减少不公平的城市化阶段,机会公平之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应该受到充分重视。

第三,维护市场的可竞争性与企业家精神的生产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定,旨在维护市场的可竞争性、促进企业家精神的生产性。从市场组织来看,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创新、就业和增长贡献上各有优势,它们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应该视为互补而非相互排斥。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工业化时

① K. Polanyi, *The Livelihood of M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p. 19 ~ 31.

②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③ G.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7 ~ 111.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页。



期一直作为重要经济力量存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诸多领域也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的用武之地;不仅如此,鉴于城市化对于包容性增长的特殊要求,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对于扩大就业群体、提高就业质量至关重要。同时,促进大型企业创新也不只是简单的反垄断,创造“自由进出”的可竞争市场条件也很重要,既有适当规模又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保持大型企业活力的重要前提。^①从产业结构来看,新业态和传统产业在提供就业和满足基本需求上各有其重要性,劳动者技能一方面有高低之分,另一方面为各种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是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从社会成本来看,不能以损害自然生态、市场秩序和社会价值为代价追求短期经济利益。

因此,应该从整体和综合角度看待创新。创新不仅依赖于技术突破,而且受到价值规范性约束。因此,既需要激励创新精神,又需要抑制创造性破坏过程的负面效应。^②如果仅从功利主义单一目的出发鼓励创新,结果可能是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企业家首先是社会人,是受到社会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创新的生产性也就是创新的包容性或者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诺。

四、人文经济范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模式

高度城市化产生的新要求,使得国家集中调控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了,尤其对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化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创新,成为社会稳定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本节围绕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协调机制,从治理目标、治理手段和治理重点三个方面,对人文经济范式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模式进行探讨。

1. 治理目标: 关注于城市化时期新问题新要求

从“经济(市场)—国家(政府)—社会文化(家庭)”系统整合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的目标应该关注维护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过程的统一。^③第一,商品化亦即市场经济,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主题,高度城市化时期继续完善的目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做出了明确部署,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二,治理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的社会治理。“去商品化”即国家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方面持续发力,特别是应该维护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公益性质,为应对老龄化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拓展政策空间。“再商品化”,主要是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以提升劳动力就业能力,典型如托育设施建设、再就业相关咨询服务等。当然,为生产生活提供必要公共基础设施,也具有再商品化特征。第三,社会公平的实现离不开国家调控。国家集中调控的功能在于整合经济与社会发展,强调市场经济要服从于社会正义。这个过程中,国家一方面积极为经济健康运行提供必要制度规范,另一方面提供充足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人的发展。

2. 治理手段: 立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和善治

人文经济范式肯定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为这是保持社会凝聚、促进共同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但是,这需要一个附加条件,即确保民众的有效民主参与。前文述及,由于资本主导与共同利益的矛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被迫采取了“民主式阶级斗争”的政治程序,期望达成利益妥协。

^① 参见 W. J. Baumol, “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2, no. 1, 1982, pp. 1 ~ 15; W. J. 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1990, pp. 893 ~ 921.

^② [法]菲利普·阿吉翁、[法]赛利娜·安托南、[法]西蒙·比内尔《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余江、赵建航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219~222页。

^③ C.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p. 120.

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工会力量衰落以及民众政治热情降低,福利国家的民主从大众政党政治日益退化为精英政治,^①可以预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性将会延续到 21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

中国与此不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中国经济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始终。在当代中国,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并成为公民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一章篇幅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旨在强调通过人民政治参与推动法治与发展的协同。经济、政治、社会治理的有效协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范式。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对于人文精神的切实践行,成为 21 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者。

3. 治理重点:着重于均衡、嵌入与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安排上更加强调均衡、嵌入与制度化建设,即国家治理的系统观和总体观。均衡既包括产业、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也包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衡可及,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嵌入,即维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保证制度、战略、政策措施的连续性与改革方向明晰,进而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有机统一,以此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一直是“中国之治”的典型特色,也是系统均衡和有机统一的重要前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深化改革,旨在进一步增强适应发展新阶段的国家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高度城市化时期需要弥补的短板。社会权利制度化的路径,在于围绕“育幼—教育—就业—养老”生命历程规划实施系统社会政策,中国对此有一个含义更加丰富的表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②这是以家庭稳定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旨在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厚植经济发展潜力。《保险法》出台后,中国一直秉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补短板惠民生。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系列具体安排,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促进教育公平、完善分配制度以促进共同富裕、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健全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都是为了适应城市化要求而进行的制度化改革实践。

五、结语

本文通过人文经济范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阐释,基于过程与联系的系统论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揭示了其科学内涵和历史意义。人文经济范式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深刻的内在人民性,超越了福利资本主义传统的人文资本主义探索,实现了价值取向、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的有机统一。只有从“范式”层面理解人文经济,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代化道路新选择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意义。人文经济范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力,在于其持续不断的理论升华和实践深化。未来,应当进一步立足于人文经济范式,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在理论层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范式成为理论自觉,在实践层面促使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历史必然。

作者单位: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兆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牛泽东

^① 王绍光《西方代议民主:由谁作主?替谁作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第 29~30 页。

